



好 读 书 读 好 书

□ 卜正民

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北京参加一次会议时，幸运地发现清史研究专家朱维铮教授也出席了同一会议。在朱老师这一代人中，他可谓极富才学，或许性情也最火爆。对我而言，他还是一位慷慨的良师益友，在我需要之时往往不吝提出明智的建议。我想通过回忆自己与朱老师在北京月坛公园的一次谈话来为中国读者介绍这一套书。当时我俩正散着步，我突然向他袒露心声，说自己曾数度迷茫——上世纪90年代初的我正处于迷茫之中——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虽然能够像朱老师那样阅读第一手文献，但还是极度渴求拥有他那般理解中文文献的本能。到底怎样我才能像理解自己的母文化那般，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呢？

朱老师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来回答我的问题：“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朱老师或许对中国同事们的研究局限多有责备，但对那些愿意付出真正的努力来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则往往慷慨相助。他相信，我们的确能够带来些什么，而且我们拥有一种中国人无法依靠自身开辟出的观察视角，因为我们对中国的观察受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经验影响，而这些经验是中国人所没有的。听他说着，我不禁想起了明朝时的一句俗语：中国人用两只眼睛

近日，《哈佛中国史》(全六卷)中文版出版，这套书是哈佛大学针对大中学生和普通读者的中国通史，被认为是继《剑桥中国史》之后最能代表西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史研究全新成果和水准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丛书共六卷，分秦汉、南北朝、唐、宋、元明和清六个时代分野，上迄秦朝统一，下至清朝终结，以一种新鲜、紧凑、好读的方式涵盖了公元前2世纪至20世纪初期中国古代王朝兴起、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进程。

站在房间外面观察中国

观察世界，欧洲人只用一只眼，其他地方的人则都是瞎子。我相信，朱老师是觉得他这一代的中国学者只睁开了一只眼，而外国历史学者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第二只眼睛。

作为一个二十来岁才开始研究中国的学者，我自然是站在房间外面来观察中国的。然而重要的是，我二十来岁的光阴正好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意味着我大致上与中国所谓的“文革一代”同辈。彼时正是西方史学经历大转折的时期，历史不再是伟人和强权间相互影响所取得的成就，而转变为普通人在其所处社会的约束与机遇中经历的生活。对于一个在此时拥抱中国明代社会和经济史的外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讽刺，因为彼时我最想求教的历史学者并非来自西方，而是一个中国人——傅衣凌。傅衣凌对与我同辈的中国历史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展示给了我们具体的研究路径，让我们知道如何用明代史料写出各个阶层民众经历的历史，而不是统治家族支配的历史。上世纪70年代末，我有幸在北京见过傅老师一面，至今我仍后悔没能向他学习更多，像我从朱老师那里学到的一样。

当哈佛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一套中国帝国时期的历史

时，我找到了与我同辈的三位历史学者，他们多多少少形塑了我在社会关系和物质文化方面的兴趣。我们并非用同一种语调或同一种国家视角(三人中一位是德国人，两位是美国人，我是加拿大人)来论述问题，但我们差不多是同一代人，踩在同一片知识的土地上。我并未做多少导引，主要是请他们引用自己和其他人近期研究的一些成果，这样他们的描述才能够与时俱进，跟上现在的知识脚步。我可不想我们只是在重复老套的故事。另外，我请他们仔细考虑在他们所写的那

个时代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写作。我希望他们抱着生命经验之复杂的想法，而不是退回到“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它该发生”那一套统一的、早已建构出的历史叙述中。他们应该从自己所写时代的内部而非外部来呈现那些岁月，但同时，他们的写作也需要囊括该时期内中国所征服的地区，这就要求他们不仅从内部来观察，还要具备全局眼光，将影响该地区历史进程的非汉人形象更加具体。这套书仍保留的一个传统是按照朝代来划分中国历史。之所



《哈佛中国史》 卜正民主编 哈佛大学出版社

以这么做，部分是因为朝代变更往往意味着正式统治者的改变，由此人民的生活组织方式也改变了；更重要的是因为朝代的确提供了时间定位，方便人们明白自己在历史的何处徜徉。所以，读者会在这一套书中见证朝代兴衰，但也能更多地了解某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书中那样只看到皇帝和大将军们的传奇故事。

我所写的元明卷与其他几卷有一个显著不同，这种不同是在整个系列的编纂后期才逐渐显露出来的，所以该特征在其他几卷中并没有出现。正如我提到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待历史，这么做最开始是为了满足我对自身的要求——我认为我们应该好好利用环境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而这些成果正不断涌现。然而，我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元明四个世纪的历史中，对民众生活经历和政治时运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因素正是气候变化。气候虽不能回答历史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我发现要回答元明时期的许多历史问题就不得不把两个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整个世界的寒冷和干燥程度——考虑进来。元明卷并非完全在论述中国自中世纪暖期到小冰期的环境历史，但它的确是在将气候变化影响纳入考虑的框架内对历史进行阐释的。

现在，我邀请你们走进这个中国历史的房间，而四位学者正站在外头观察它。我希望你会同意，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些你会错过但值得留心的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能够激励中国读者用自身的内部观察视角来检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本文为《哈佛中国史》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报记者 王昱

西方人眼中不一样的中国

最近几年，老外写的中国通史似乎一下子成了出版商们的香饽饽。记得笔者上大学那会儿，能借到的这一类汉语书籍只有《剑桥中国史》一套而已，图书馆里还存量有限，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直到毕业也没看全。但转眼间，几年的功夫里，先是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被翻译出版，莫名地引发国内追捧。而今，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哈佛中国史》又被汉化，可以想见，不久之后，微信朋友圈里又会掀起一波晒书秀格调的狂潮。

我们为什么突然这么在乎老外怎么看中国，这是个值得玩味的问题，西楚霸王项羽有言：“富贵不归乡，如衣锦夜行。”而毛主席又云“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由此可见旁人的评价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只有“活得精彩”时，才愿意给外人去评说。这种心态投射到历史学里，就是我们的史书看人下菜碟的倾向严重，天子本纪、诸侯世家、大夫列传，平民百姓连传都不传(所以中国自古没有严格意义的社会史)。

对人如此，以前无论业余还是专业的读史者，如果要费心读几本洋人写的书，大多都会把目光注视在美国、西欧、日本这些

个比我们牛的国家身上，精英们津津乐道费城先驱们的高瞻远瞩、比较光荣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成功异同，探究明治维新成功的根源。至于巴比伦、阿拉伯、印加、玛雅这些最终被世界潮流所卷走的中华文明的难兄难弟，我们是不愿花时间了解的。即便对中华文明自身，我们也满足于传统史学给我们讲的那些帝王将相的故事，外人说了我们啥我们是不愿意了解的——反正也不会说什么好话。

从西方人的角度讲，倒不能说中国人的这种心态是完全错的，抛开李约瑟那种半路出家的“非主流”不谈，过去西方史学对中国历史确是没啥好话，西方史学虽然不承认自己看人下菜碟：讨论一个文明的衰败时往往比讨论这个文明兴盛时更感兴趣(《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帝国衰亡史》)，但喜欢从文明的发展轨迹中总结经验。在这一点上，王朝如走马灯般轮换，还治出一套“治乱循环”理论的中国历史无法纳入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中——大哲学家黑格尔说过一句很伤中国人民感情的话，他

说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

不知是不是因为受了此话影响，“二战”以前中国史学的研究在西方向来就很寡淡。新中国成立后，老美因为惊呼“失去了中国”，赶紧招呼一帮史学家对这个陌生的敌人加紧研究，由此形成了以费正清为首的“哈佛学派”，有关中国史的正经研究这才算真正开了张。近年来，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西方大学里愿意听一听中国历史的学生越来越多，这才促使哈佛大学出了这套通史去抢剑桥的生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国人读史习惯也没啥错，历史是不负责给倒下的文明打幡戴孝的，只有那些正在向上攀登的文明才值得被反思。

然而，即便有所重视，西方人写中国史却又是很难的活计。古代中国史家写历史讲究“以史为鉴”，其最终目的是为后世君王驭下和臣子混官场提供经验，于是热衷于在史书里大篇幅记载君王和臣子们怎么勾心斗角。这种写法其实不比写《甄嬛传》难多少——去秘书监(皇家档案馆)查查前朝的掌

故，再结合自己官场经验合理想象一下，一本官方正史往往就这么出来了。然而，西方的史学传统却是试图透过史实的表象抓住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一点运用在中国史上就很难。尤其通史写作往往是个接力工程，多位作者对一个还没有形成共识的文明进行分段写作，很容易就搞成盲人摸象。

具有开创性质的《剑桥中国史》就不是很成功，除了《晚清史》《民国史》《共和国史》这三段因为是费正清的老本行，写得确实出彩之外，从秦代到清前期的大段记叙都让人难以勾画出明确的轮廓，很多章节既丧失了中国人写中国史时描写“人玩人”的精彩，又没有西方人写西方史时那种脑洞大开的锐利洞见。只能说是一本合格的大学教材。

相较之下，讲谈社的《中国的历史》确实有进步之处，由于日本学者大多兼具东西洋史学的造诣，这套通史中几乎每一本都有自身一以贯之的内在历史逻辑。无奈的是，由于日本特有的“山林民族”特质。日本史学家们在写作中似乎犯了跟当

年日军打仗时同样的失误——单打独斗时战术精巧，总体协同则一塌糊涂。每本书各有各的精彩，连起来看却又是各说各话，捏不到一块去。

从这方面说，学界和普通读者对新出版的《哈佛中国史》抱有期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本书对中国史采用了“掐头去尾”的写法，即不写商周先秦时代，也不写中国近代化的历程，唯独钟情于从秦汉到清代这两千年“帝国史”的描写。需知这一段中国史正是当年被黑格尔批判为“没有历史”的时代。表面上看，中国人如鬼打墙般在治乱中打转，其内到底有什么变化呢？考虑到该书的总编卜正民本来就是全球史的倡导者，这套通史也许会给我们一个统一的、独到的答案。

当然，不管这个答案是否最终能否得出，我们中国人读西方学者写的中国通史类书籍都是不错的，它的确能为我们打开另一只眼，让我们看到我们自以为熟识的历史背面潜藏的某些规律——至少，你能明白咱中国历史也不仅仅是帝王将相之间没完没了的互撕。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设计：壹纸工作室
本版编辑：李皓冰
美术：牛长婧